

为世界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智慧”

本报记者 赵晓霞



北京中轴线和城市景观。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将至，世界遗产再次成为关注热点。这些遗产既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因此，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人类文明赓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作为这一理念的践行者，中国目前世界遗产总数达60项，与意大利并列全球第一。其中，文化遗产41项、文化与自然双遗产4项。

这些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独特魅力的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如何？为世界遗产保护工作贡献了哪些经验……就此，本报专访了长期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并致力于遗产保护理论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高级工程师孙燕。

申遗捷报频传

记者：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那么，基于这一共识，近年来，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呈现怎样的面貌？

孙燕：1985年，中国正式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在去年迎来加入《公约》40周年。也是在去年，西夏陵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使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

近年来，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迅速，以2016年至2025年这10年的发展情况为例，中国多项文化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可谓捷报频传，而且每一项都承载着独特的价值。

于2016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广西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是中国第一处岩画类世界文化遗产，生动地表现出当地古骆越人在左江沿岸一带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

于2019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良渚古城遗址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作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城址，良渚拥有规模宏大的古城、复杂的水利系统等，为国际学术界提供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独特样本。

2024年，“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纵贯北京老城南北的“北京中轴线”全长7.8公里，承载着元明清三代的都城理想，其“中”“和”的规划思想体现了中华文明独特的秩序美学。

2025年，西夏陵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西夏王朝的陵墓遗址群，其独特的陵园建筑、精美的石刻文物，为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增添了新的注脚。

从“抢救性保护”到“系统性保护”

记者：除新增申遗成果外，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孙燕：还是以这十年为例，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经历了从“抢救性保护”

向“系统性保护”的变革。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成为业界共识，包括从被动性抢救到主动性预防的转变、从单体保护到整体保护的拓展、从部门单打打到多部门协作的变革。“北京中轴线”的保护管理可以作为遗产地系统性保护的典型案例：遗产地建立了央地协同工作机制、市级和区级地方多部门协同管理机制，以加强部门之间的配合；出台《北京中轴线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加强多遗产构成要素的整体性保护。

此外，文化遗产法治与制度建设也在近年取得重大进展。自2025年3月1日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开始实施，新增加的文物预防性保护、活化利用等内容，为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体系实现创新与突破。近年来加入世界遗产大家庭的良渚古城遗址、北京中轴线、西夏陵等均编制实施了文化遗产保护管理规划，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与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之间提供有效衔接。同时，以世界文化遗产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为例，杭州市针对遗产地周边环境建设管控的问题，率先开展遗产影响评估制度化建设的尝试。2025年，杭州先后发布了《杭州西湖世界遗产影响评估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等，并在之后发布实施《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建设项目遗产影响评估工作规程》，构建遗产影响的可识别、可分析、可追溯全流程监管链条，有效促进遗产空间管控要求与城市建设发展之间的统筹与协调。

科技赋能遗产保护

记者：在科技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为遗产保护的方式和效率带来哪些改变？

孙燕：首先，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遗产监测，助力遗产地精细化管理。遗产地监测预警系统建设逐步完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总平台上线以来，已在遗产数字化记录、保护管理状况评估、灾害预防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此外，多处世界文化遗产的自然灾害预警系统建设与运行取得突破性进展，这类监测系统基于遗产地数字模型和集成的气象、水文等环境数据，实现对文化遗产可能面临的洪涝、地震、滑坡等自然灾害的提前预警。比如，良渚古城遗址于2022年启用“良渚遗址5000+”数智应用，平台具备的监测功能可将线下“遗址监管网格”与线上风险评估结合，综合

利用无人机、周界雷达、热成像、视频AI算法模型等多种手段，对重要遗址点位进行实时监测。

其次，科技手段与保护技术创新深度融合。如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借助扫描技术将瓷片胎土、釉料、纹饰转化为数据，通过AI算法实现碎瓷片的智能匹配与拼对，大幅度提升御窑陶瓷文物的修复效率。

再者，在遗产保护技术创新方面，敦煌研究院致力于壁画病害机制与修复关键技术的研究。针对壁画中常见的酥碱、起甲、空鼓等病害，研究院研发多光谱图像无损检测技术以更好地识别壁画底层信息，为细致评估壁画形成演变的整体周期提供条件；利用数字技术记录并虚拟复原复杂空间，并就其保存环境进行模拟复原，深入研究病害作用机理。

丰富全球文化遗产保护实践

记者：请您结合具体案例，谈谈中国在保护理念、技术手段等方面为世界遗产保护提供了哪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孙燕：最为直接的，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阐释成为向世界真实、立体、全面展示中国的窗口。

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后，国际考古学界对该遗址水利系统、社会分层、信仰体系的发展水平给予高度评价；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向世界呈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为活态遗产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范本；北京中轴线则通过其富于韵律与对称美的城市历史景观向世界展现了“中”“和”的中国传统哲学观，让世界能够更为深入地认识到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理念的智慧与活态传承；西夏陵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提供了重要见证。世界遗产委员会高度评价赞赏中国政府在西夏陵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方面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突出成绩。

而以世界遗产为媒介，国际交流合作也日益深入。中国考古和文物保护机构走出国门，积极在埃及、洪都拉斯、柬埔寨等国的世界遗产地开展多项联合考古研究、国际援助遗产保护工程，将中国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和技术推向国际。

2023年，中国推动成立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设立了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基金。到目前为止，资助的保护项目涉及联合考古、文物保护修复等不同方向。展望未来，中国智慧将继续丰富全球文化遗产保护实践。



图左为科研人员在良渚古城遗址世界遗产检测管理中心利用数智应用远程操控无人机；图右为无人机从良渚遗址无人机机场起飞进行遗产要素定期巡查。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摄

而成，为中外彩陶考古及艺术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在成果传播与公共考古方面，推出《大邑商博物馆奇幻夜》《商王的宴请：吃在大邑商》《子商上学记》等大众喜闻乐见的科普读物，让考古成果走近公众。

与此同时，发布会还举行《科技考古集刊》《文化遗产保护集刊》首发式。两部集刊聚焦科技考古前沿方法、文物保护关键技术、文化遗产传承利用等方向，既是实验室建设成效的集中展示，也是我国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学术成果的系统呈现。



对于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我们是很熟悉的了。《夏鼐日记》是很多考古人的必读书目。还有《夏鼐文集》、《夏鼐传稿》和《夏鼐书信集》等，都可以让我们深入了解这位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奠基人。那么，对于另一位奠基人梁思永先生，你又知道多少呢？《梁思永夏鼐往来书札》这本书正可以让我们走近这位“考古研究所的灵魂”（夏鼐语）。

正如也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陈星灿先生在序中所言，梁思永先生只活了不足50周岁，但他的一生，堪称精彩：他是第一位到海外学习考古学的中国人；第一位完成了“系统的东北考古调查”的中国人；第一位发现了“后冈三叠层”的中国人——在考古学上初步澄清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商文化的关系；第一位提出仰韶文化向东发展，龙山文化向西发展的中国人；主编出版了中国第一本田野考古报告《城子崖》，开创了田野考古发掘报告的体例。

夏鼐初识梁思永的风采，是1935年春在安阳侯家庄的西北冈。准备去英国留学的他需要有在田野实践的经验，于是来到了殷墟。夏鼐先生回忆，“梁先生跑上上季发掘起土所累积成的大土堆上，对这些拣选好的工人做了一番动员讲话。然后将他们分组归到各工地去挖掘和运土。几百个工人听着指挥，便井然有序地工作起来了。”在夏鼐眼里，梁思永有着指挥千军万马作战的气概。

后来，在英国学习期间，夏鼐一直关注梁思永的学术研究，将梁思永的著作视为必读书目。他学成回国后，直到1941年春，才在宜宾的李庄与梁思永再度会面。

从1949年5月至1950年7月，夏鼐也面临人生中最重要抉择。正在浙江教书的他，收到各种邀约，最终选择就职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显然，梁思永的多封信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内容在这本书中的前十几封信中看得很清楚。

1950年5月19日，周恩来总理任命郑振铎兼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任命梁思永、夏鼐担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抵京后便去看梁思永先生，梁先生对他说：“所中一切事情都由我和郑先生来管好了，我只希望你 and 所中其他有田野工作经验的高级研究人员，带着一班小伙子们在外边多跑跑。训练年轻的田野考古工作人才是眼下最迫急的任务。我是没有机会参加野外工作了。书面的指示是不能代替当地实际工作中的亲自下坑指点。”同年10月8日，从浙江来到北京才1个星期的夏鼐，便带领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奔赴河南辉县琉璃阁和固围村，开始了考古研究所建所以来的第一次科学发掘。从此之后，梁思永坐镇北京，夏鼐在前方，两人通过密集通信探讨工作、共同推进田野考古成为常态。于是就有了这些珍贵的信札。

一般来讲，去信和来信保留在不同的人手里，很难有机缘再凑在一起出版。该书的编辑汤超说，资料整理工作的开展，是以王世民先生收存归档的这批梁思永先生信函为切入点，它们详细记录了考古研究所的创制历程与科研工作的开展细节。为完整呈现历史原貌，又补充了夏鼐先生致梁思永先生的40通书信。经过重新编排后，一来一往的书信居然实现了无缝连接。我们看到，两封信的间隔，正常情况下不会超过4天，而且有时一封信才写到一半，又一封信



好好读读这些信札吧

——读《梁思永夏鼐往来书札》

杨雪梅

就寄到了，于是又接着写。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看这本书，心情自然是百转千回的。

一切事业的发展都需要有人鞠躬尽瘁。考古研究所建所前后的困难和复杂过程从这些信件中都可看到。梁思永躺在病榻上，制定规划、申请经费、招揽人才、购买图书、编辑书刊、校对文稿、应付日常工作等。而夏鼐从事田野发掘、建立田野规范、培养人才、撰写调查和发掘简报、处理地方关系等。考古研究所在他们两位的直接领导和谋划下，才从无到有，稳步发展；新中国的考古事业，也因为他们的不懈努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读者感到最过瘾的肯定是彼此间的心有灵犀，还有一来一往间学术火花的迸发。那个躺在藤椅上的病弱之躯对于田野考古依然是那么敏感，那个在前方发掘的人总是可以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比如，1950年11月26日，梁思永写给郭宝钧、夏鼐、苏秉琦的信的结尾是：“大前天此间气温突然下降，不知辉县也受到寒流的袭击否……三大墓进行到什么深度了。琉璃阁还继续做着吗。即此敬颂据安。”接下来就可以看到夏鼐先生11月27日对于廿二日的回信，“今日雪停，而天气寒冷，同仁等仍决定赶工，万一至十二月底仍有二墓未完工，恐只能等候明春再做”。

辛苦的考古工作中最兴奋的事情是什么？“前星期于中间大墓抚土中获得一错金银之铜铺首，颇精美，廿四日于西大墓之西，掘一小墓，获得陶器四五十件，又嵌玉之金带钩一件……”12月1日，梁思永的回信说，“这三大墓的前途正未可限量也。西大墓之西既出如此富有的小墓，三大墓的周围想来还该有其它小墓。这不知道是否会影响到我们明年的田野计划，请来信示知。三大墓希望能于年底做完，不然就得派专人连同当地政府人员守卫；麻烦就大了。但今冬特冷，不知同仁能坚持到底否，甚念甚念。”

12月4日，夏鼐回信说：“今日为止，西大墓已深达九公尺，东大墓七公尺，中大墓六公尺。因墓内不能容纳多人，故工人数依旧。惟采取奖励办法，使人能做一半人的工作效率，工资依工作效率增发。从前每五日深掘一米，现下可以两天半至三天掘深一公尺。如无意外变化，西东两大墓皆可于年底完毕……”

1953年的秋天，梁思永先生就病倒了。这些书札也就戛然而止了。1954年他最后一次进入医院，恰巧和夏鼐同住在一个医院里。夏鼐显然感受到了这一次梁思永住院的严重性，“这个月中，我几乎天天打听他的病情”。4月2日梁先生去世这一天，夏鼐的日记写得分外详细，“餐后，我再到梁先生病房去问病，里头的人将门推开，我看见屏风已移开一些，病床床上已是空的了。梁思成先生，站在床边，看见我时将两手一伸，表示一切完了。我看见这情况悲伤之至。掩泪返室……”

好好读读这些信札吧，你一定可以读出中国考古人最珍视的那些传承。

拉萨市拉鲁湿地水域面积20年增加232%

本报拉萨电（记者琼达卓嘎）日前，被誉为“拉萨之肺”的拉鲁湿地发布生态监测报告。报告显示，近20年来该湿地生态显著改善，水域面积增加232%，沙地裸地减少70%，植被指数提升44%。国家级保护动物从9种增至25种，黑颈鹤、白唇鹿、水獭等珍稀物种频繁现身。

拉鲁湿地是青藏高原面积最大的城市天然湿地，承担着水源涵养、气候调节等重要生态功能。自拉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以来，拉萨市坚持“保护优先、严格管理、系统治理、科学修复、合理利用”原则，持续推动湿地保护修复。

报告指出，湿地生物多样性日益丰

富。目前，记录维管植物438种；鸟类174种，繁殖水鸟从1种增至12种，重点保护鸟类28种；借助环境DNA技术新发现3种国家二级保护鱼类。

科技赋能成为湿地保护亮点。拉萨建成首个生态系统综合监测平台，运用AI鸟类识别、水下鱼类监测等技术，实现智能化管护。同时，湿地打造自然教育基地，常态化开展科普宣教，全民参与保护氛围日益浓厚。

拉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拉姆次仁表示，将以此次报告发布为契机，持续深化保护、科研与宣教工作，推广高原湿地保护经验，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建设青藏高原生态文明高地贡献力量。

本报电（记者赵晓霞）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京发布考古报告、专著、图录、科普读物、论文等数十项成果。

发布会集中推出《汉魏洛阳城宫城宫墙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等13部考古报告，覆盖史前、夏商、历史时期各阶段，为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提供了坚实支撑。

在专著发布中，既有梳理学科发展成就的《中国考古学十年（2016—2026）》——全面总结学科建设、田野发掘、研究阐释、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

发布多项研究成果

理论创新、科技考古、海外考古等领域标志性成果，又有《中国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探索五讲》等理论性著作，还有《甘棠美政：唐代的德政碑》等专题研究。

近1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持续在埃及、洪都拉斯、乌兹别克斯坦、罗马尼亚等国家开展联合考古工作，并于今

年4月与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联合启动希腊“安杰洛卡斯特洛”考古项目。本次发布的《大道东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赴外考古成果》以珍贵图片、翔实资料全景呈现考古研究所开展的中外考古合作项目。《罗马尼亚库库特尼文化彩陶集萃》由联合考古队员奔赴多个博物馆汇集